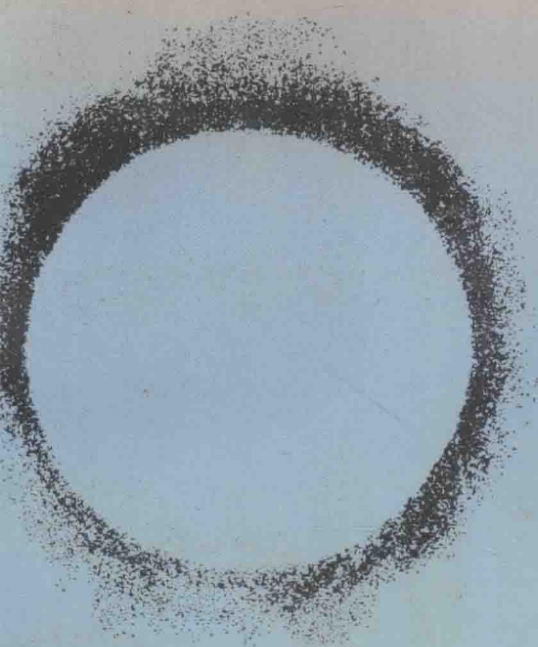


WENZHOUCHENGXIA

温州城下

• 洪水平著



鹭江出版社

82.7151
3125

WENZHOU

温州

城下

CHENGXIA

洪水平著·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08号

温 州 城 下

洪水平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杭州半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5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10-051-2

I·8 定价:6.00元

目 录

缘 起.....	(1)
第 一 章.....	(6)
第 二 章.....	(24)
第 三 章.....	(54)
第 四 章.....	(81)
第 五 章.....	(118)
第 六 章.....	(141)
第 七 章.....	(177)
第 八 章.....	(208)
第 九 章.....	(240)
第 十 章.....	(271)
第十一章.....	(305)
后 记.....	(333)

缘 起

十多年前，记不起是什么月份，我在《温州日报》社闲坐。总编辑说，现在地方报纸不景气，日子不大好过，要弄点花样吸引读者，多推销几份。他们搞了一部长篇小说连载，好像说书似的，每天留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尾巴，效果还不错。他说，可惜连载的小说不是本地货，与读者隔了一层，如果是本地风光，可能会更好。他对我说：

“温州解放、叶芳起义，你不是都经过的吗？写一部《温州解放演义》怎么样？我替你连载。”

1949年5月与叶芳代表团谈判的时候，我是我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会前会后、里里外外的事，全都清楚。随叶芳起义的干部中，好几位后来和我一起工作过，其中有两位和我私交甚笃。从这一方面考虑，我倒真可以写点东西。

不过，我有一个历史形成的缺憾：我二十来岁就进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这是块老革命地区，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国统区很不一样，耽长了，对国统区，特别是城市的情况很隔膜。对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种种，所知也极为有限。既然写两军对垒，总得知己知彼，我昧于知彼，这怎么成。闲谈时说的话，不必当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一天，在温州档案馆里，我发现了两本笔记本，逗起了我写

本书的念头。温州档案馆里存有国民党温州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永嘉县政府、县党部，以及两级法院的档案，数量可观，仅目录就好几大本。除了正规的档案，还有一批杂七杂八的东西，既未整理，也无目录，堆了半个房间。1949年8月温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我从军管会里接过全部档案的时候，就经手过这批未曾归档的档案。以后档案馆搬了好几次家，它们也跟着搬来搬去。时过境迁，我也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七十老翁，几乎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也是闲谈，档案馆长诉苦说，档案部门一向不被领导重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这半间房子的东西，放了四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经费和人手来整理，说不准那里面还有好东西呢！

未知出于什么机缘，我脱口而出，说道：“我来翻翻看，如果有价值，就正式编目录。”

人是很古怪的动物，忙的时候，老是想礼拜天，好舒舒服服闲上一天。等到六十足岁离休了，让你“游荡为生”，全闲着，又浑身上下不得劲。第二天起，我就坐到档案馆三楼一张小桌子旁，逐件翻阅起这批未能称为档案的档案来。

这里面花样可真多，有中学生统考的考卷，小学生的得奖作文，有各种机关的伙食帐，有莫名其妙、无头无尾的公文和草稿的残本，……如果说没有价值吧，倒也反映了某一方面的历史面貌；说一定要保存吧，也不见得。其中很大部分是私人信札，收信的、写信的，都名不见经传，连头面人物也不见一个，而且往往只有名，没有姓；只有日月，没有年份。内容则是家庭琐事、亲友行踪、生意好坏、身体健康与否等等，还有毫无实际内容的“平安信”和请安问好的信，偶然夹着几句关于物价上涨的牢骚和几个不知来历的人物，算是比较可以一看的内容了。

我翻了几天，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难以决定取舍。心里想，好奇怪，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会跑进国民党政府的

档案里来的？只有私人信件还可以解释，大概都是抄家或邮检时搜集来的吧，派上用场的都拿走了，这是剔下来的废品。就这样胡思乱想，漫不经心地翻着这些发黄的纸页。有一天，快到下班的时候了，顺手从纸堆里抽出一个档案袋，我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袋上没有一个字，我伸手进去，掏出两本簿子来。

这是两本竹简纸订的簿子。竹简纸这种纸页，解放以后，特别是兴起横行书写以后，是看不到了，在以前可是很流行的。纸身是花笺纸，讲究点的用官边纸，灰色或者兰灰色水印的直条格子，格子上头用弧线连在一起，像一排竹简，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小学生、中学生常用作日记、作文簿子。这两本用的是官边纸，纸张全发黄了。我随便翻开，看了几页，立刻被吸引住了。以后花了两天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两本簿子，封面上没有一个字，乍看好像是日记，好多则记有日期，但大部分没有日期，所记的也不尽是当天的事。内容非常庞杂，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身边琐事，无不记载，也有一些议论，其中好多篇，属于内幕秘闻之类。长短也很不一致，有几百字一篇，也有上万字的。文字很通顺，用词遣句，老辣周详。字也写得很老练，起笔收笔之际，魏碑的笔意很浓。每一篇，甚至一篇之内，墨迹浓淡、字体正草很不相同，显然不是在短时间里一口气写成的。

看完之后，只有两点很清楚：一、笔记从1940年或1941年就开始了，断断续续，记到1949年5月温州解放前夕。二、作者曾在永康、丽水工作过，以后到了温州。他知道许多内情，接触一些机密，看来是党政机关中人，许多话分明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说的，却又牢骚满腹，对现状大为不满；好像能接触一些头面人物，社会地位蛮高，但又处处流露出生活凄苦的痕迹；对社会政治情况的观察，相当细致而深刻，但有的又十分粗疏糊涂。

我掩卷再三思索，只能作这样的设想：笔记的作者是本书

记、录事，顶多是个科员这样的小公务员，没有背景和靠山，但又是老文牍，熟悉“等因奉此”、“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一套公文程式，精通行文的手续与诀窍，经过他的手，不会出纰漏，差不多各级机关里都有这样的“老夫子”，办公事少不了他。这种人一点不显眼，在省长、专员、县长、主任、科长等等大大小小的显要旁边，畏畏缩缩、窝窝囊囊地活着，连影子也比别人淡一些。他们身在机关内部，倒真是个知情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都冷眼旁观，记在心里。侥幸！这位仁兄却把所见所闻所想都记录下来。而且落在我的手里，派上了用场。

笔记里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序言：

“……平生碌碌，为人不齿。寒夜陋室，一灯如豆，面对纸笔，如遇知己，聊记见闻，以抒愤懑……。”

这是个孤单寂寞的灵魂！而他的笔记，却使我能从内部看到国民党政权隐秘的一面和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

笔记的作者并不回避姓名，几任专员、县长、甚至邱清泉、陈仪、周岳等达官贵人，他都直署其名，而他自己的姓名，一直没有提起。只是笔记里保存一位名“淑”的女子写给“涛兄”的信，从内容和语气看，“涛”就是这位作者。

我曾把这事请教过当年起义的同志，而且复印了几页笔记，请他们鉴定。他们仔细看了，也记不起谁的名字中有一个“涛”字。只是说，从各种迹象看，可能是永嘉县政府里一个包办科长的手笔。但此人又没有笔记里的眼光和文采，所以又不像。总之，还是拿不准。包办科长是很特别的一种职务，其人并非科长，却办科长的事。国民党机关里很多科长，是行政长官口袋里的私人，就是俗称的“裙带官儿”。这些人中，不乏精明练达的干才，但有的昏庸贪婪，有的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只知道酒肉征逐，纸醉金迷，不理公务，也办不好公务。于是找一个老手，多半是他的穷亲戚穷朋友，替他办事，谓之包办科长。既然是科长，

也算是政府中内圈中人，但又不是正牌的官儿，正是笔记中反映出来的不尴不尬的情形。但笔记作者是不是包办科长呢？恐怕谁也说不出一个究竟。我也向玉环的老战友打听过解放初期玉环小教的情形，直至查到当年全县小学教师的花名册，竟没有一个叫“淑”的。这两个人，也许都是化名。

说来说去，这一些全是猜测，有把握、“有案可查”的，只是“涛兄”二字。这本笔记，就定名为《涛兄笔记》，用一个“兄”字，一以保存原貌，二以点明此人是个男子。

从《涛兄笔记》中，我选了十篇，作为这部书的一部分，以补充我的知识的不足，除了明显的笔误，对文字未做任何改动。如果我的这部书有幸出版，那末作者该是两个人，一位当然是鄙人，另一位就是“涛兄”。推算起来，涛兄如果还活着，已经八十多甚至九十多岁了，即使他看到这部书，愿不愿意承认这著作权，也说不准。

原来准备采纳总编辑的主张，以《温州解放演义》作为书名，但最近看到一位名人的文章，说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像《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那样反映历史全貌的“演义”，为之惋惜不尽云云。这使我吓了一跳，不敢擅用“演义”二字。现在这个名字，容易使人联想起“城下之盟”。回想当年，叶芳的一位部下看见起义的协议书时，大叫“这不是城下之盟吗！”竟痛哭流涕，几乎推翻了协议。但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涂脂抹粉，任你打扮的弱女子，在她面前做不得假，咱们还是老老实实为好。当年的起义将领，好几位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即使见怪，也不过一笑置之，他们是人民的有功之臣，解放以后还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想来不会计较这些末节的。

第一章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成立大会的文艺节目刚刚结束，中共浙南地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的警卫员找到郑丹甫和胡景城，说道：“首长请你们去。”

这里是浙江南部连绵不断的群山中的一个小村庄，位置在瑞安县靠近青田、文成，地名叫板寮。它的西北面，高度一千三百多公尺的中子山主峰在晴朗的星空中矗立着。这村子只有五座瓦房，龙跃住的是唯一的一座楼房。房间里除了用门板搭的床外，只有一张小方桌和三条小板凳，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放在桌子上。以现在看惯了电灯的眼光来看，灯光昏黄，但与当时老百姓点的火篴来比，已经算得上灯烛辉煌了。

郑、胡两人跨进房间时，龙跃正在看信，旁边坐着吴荣膺，看见他们进来，吴荣膺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招呼说：“老郑同志……”，郑丹甫是地委组织部长，纵队副司令员。

“老胡同志。”胡景城是地委宣传部长，纵队政治部主任。

吴荣膺是永嘉县委委员、三溪区委书记，以前是特委机关的交通，他们都很熟悉。

吴荣膺让出凳子，坐到床铺上。

龙跃把信递给郑丹甫，说道：“这是老曾写来的信，你们先看。”

信是这样的：

“龙跃同志：

据陈达人先生反映，国民党温州专员翁光辉被士绅控告‘剿匪不力’，即将下台，叶芳谋当专员，要求张千里先生相助。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请即复。详情由荣膺同志报告。

曾绍文 1948.11.25.”

郑丹甫把信交给胡景斌，笑着说：“这个曾绍文，一个字也不肯多写。”

曾绍文是永嘉县委书记。信中提到的陈达人是国民党永嘉县参议员，当地的大绅士，他与浙南共产党的交情已经有十多年了。1938年，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很热闹，陈达人的女儿陈禹铭和儿子陈易都是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陈禹铭和吴荣膺的叔叔，浙南特委统战部长吴毓结了婚，1943年吴毓不幸牺牲，陈易、陈禹铭先后到苏北新四军去了。吴毓的儿子一直由陈达人抚养。从抗战初期开始，陈达人的家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

中共浙南地方委员会以前叫浙南特区委员会，抗战后期移到了巾子山区，陈达人的家在温州郊区郭溪宋岙，正是巾子山根据地经过瑞安、永嘉边界通向温州的大门口。

龙跃对吴荣膺说：“你把张千里的情况给我们说说。”

吴荣膺说：“张千里是陈达人的妹夫，也是郭溪人。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第二期毕业生。青田的陈诚也是这个炮兵科毕业，不过是第八期。张千里起初在孙传芳的手下作事，现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当年是他的同事。北伐的时候，张千里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第二师中将师长，抗战时是第九战区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参谋长。”

胡景斌问道：“那么，张千里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吴荣膺说：“大约是1939年，张千里被挤出了部队，成为蒋介石重庆行营的高级参议；后来调兵役部当参议，都是吃粮不管事

的闲职，很不得志，1946年辞职回家。

这个人看不惯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常常引用岳飞的话，说‘文官不爱钱，武夫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他把自己的家取个名字叫‘蛰园’，下下棋，写写字，不大出去应酬。”

龙跃问道：“他跟陈达人关系好吗？”

吴荣膺说：“张千里的兄弟都在温州，但不大来往。他的亲戚当中，陈达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有阅历，会办事，他跟这个妹夫最谈得来。张千里没有多少财产，手头几个钱，也都交给陈达人投资做生意，到时候分红利，平时不大过问生意上的事。他们是郎舅至亲，关系很亲密的。”

郑丹甫问道：“这位张千里先生的政治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吴荣膺说：“他当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时，军长当中有李仙洲、黄维、关麟征等名将，很难驾御，有什么事，集团军司令周岳都让他先去疏通疏通，可见在部属面前威信也蛮高。衢州绥靖处主任汤恩伯，他也很熟，陈诚尊他为前辈。他回家以后，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温州每一任专员、保安司令、县长、师管区团管区司令上任，都来拜访。他如果想作官，我看并不难。陈家的人告诉我，这些达官贵人来拜访，他都淡淡的，不热情，有时甚至不去回拜，从这些情况看，他对官场已经厌倦。”

吴荣膺继续说：“张千里刚回家时，对蒋介石虽然不满，可也看不起共产党。后来接触了不少穷亲戚穷朋友，对社会的病根才有了点认识。陈达人和我们来往，也不瞒他。他看得多，听得多了，觉得共产党真的是为老百姓办事，真的不爱钱，渐渐地思想起了变化……”

吴荣膺忽然想起一件事，说道：

“一年多以前，国民党派兵到纸山来清乡，情况很紧张，我和区委几个同志就躲到陈达人家里，在西花厅开会。张千里正在陈

家，他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但他是老行伍，膘了一眼，就看出我们腰里都藏着短枪，就去问陈达人。陈达人告诉他说，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

说来也巧，那天永嘉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带几个人，趁着清乡到陈达人家商量成立戡乱委员会的事。陈达人把西花厅的门锁上，在正厅里接待他们。据说，张千里怕出事，相当紧张，陈达人倒很坦然。事后，张千里对陈达人说：“抗战时期，禹铭、陈易是共产党，我早听说了，料不到你与他们的关系这样深。我问你，党部的人来，这几个共产党知道吗？”

陈达人说：“他们知道”。

张千里说：“共产党都带着枪，你不怕出事？”

陈达人说：“共产党对人真诚，不会有事的。”

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很平常，但对张千里却震动很大。他回家后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好半天，第二天，把两支20发驳壳枪交给陈达人送给我们。陈达人替我们买枪，有时也通过他的关系。”

龙跃点点头，说：“张千里送枪的事，我是知道的。”

胡景斌问道：“你跟张千里有接触吗？”

吴荣膺说：“排起辈份来，我比他小两辈。起先他都避开我，后来他也随便跟我闲聊，还叫我‘吴先生’……”

胡景斌颇有兴趣地问道：“那你怎么称呼他？”

吴荣膺笑着说：“我叫他舅公。”

龙跃问道：“叶芳又怎么会找到张千里的呢？”

吴荣膺说：“他们原来并不认识，叶芳到温州，就去拜访他。张千里的‘蛰园’在城里张府基，很宽敞。叶芳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看中了这‘蛰园’，透露出要租房子的意思。张千里看叶芳还爽快，又看在汤恩伯、邱清泉的面子上，就请他住进来，两家人住在一起，渐渐无话不谈。最近，翁光辉下台的风声越来越真，叶芳想请张千里到陈仪那里疏通一下。”

龙跃问道：“陈达人要你们到这里来请示的事，张千里知道吗？”

吴荣膺说：“知道。还是他自己提出来要问问‘山上’。”他笑着又说：“他虽然是个中将，胆子却小，他要问妥当了才办。”

这句话后面有一句潜台词，大家心照不宣。张千里的老家在游击根据地的边上，他不得不考虑。

龙跃问道：“你们看，该怎么办？”

胡景域说：“张千里把房子叫‘蜚园’，‘蛰居斗室’，分明是对蒋介石不满。”他问吴荣膺：“张千里该六十多岁了吧？”

吴荣膺说：“他只有五十五岁。”

胡景域说：“那末，他回来那一年，不过是五十出头，离退休的年龄还远着呢。这几年不一定不想出仕，怕是不得志吧。……好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起初都因为受排挤，受打击，对蒋介石不满，加上周围的影响，渐渐清醒，转而支持我们。张千里办事先要问问我们的意见，说明了他是信任我们的。我看……”

他停顿了一下，说：“既然张千里能够帮助叶芳当上专员，我们是不是可以动员他自己去当专员呢？”

郑丹甫说：“可以试试。”

龙跃沉思了一会，说道：“看他几年来的情况，愿意靠拢我们是肯定的了。但动员他去当专员，怕不大容易。不过，丹甫说得对，我们不妨试一试。如果他愿意出山，当然最好。如果不愿意，也不能勉强他干。那末，就支持他为叶芳活动。叶芳当上了专员，我们可以通过张千里、陈达人去影响他，比毫不相干的人当专员总还好一些。”

郑丹甫说：“我们动员他去当专员，是把他看作自己人，他会觉察到的。”

龙跃点点头，吩咐吴荣膺说：“你回去告诉老曾，尽量动员张千里先生自己去活动专员。至于是直接找他谈，还是通过陈达人

先生，由你们商量着办。如果他不同意，那么就支持他为叶芳活动。”

郑丹甫问道：“张千里的事，除了老曾和你，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吴荣膺说：“我只向老曾同志报告过，没有别的人知道。”

郑丹甫说：“这事要保密，泄漏出去，会使张千里、陈达人先生发生危险，连叶芳的专员也当不成了。”

他向龙跃请示说：“这件事只让他们两个人知道，不要在县委里讨论，除非出现大变化，不必再来请示了，请老曾斟酌着办。”

龙跃说：“好好，要注意保密。”

胡景城问道：“你们有没有经常送《浙南周报》和《新民主》月刊给他们？”

吴荣膺说：“陈达人那里有送。”

胡景城说：“以后每期都给张千里先生一份，你跟老曾说一声。”

吴荣膺答应着，站起来准备走了，龙跃要他坐下，一面喊警卫员说：“有什么好吃的吗？”

好像是早有准备似的，警卫员转身端进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烤番薯和烤山药来，说道：“阿兰阿妈看你们不睡觉，重新起来专门用银炭烤的。”

阿兰阿妈就是这房子的女主人。山村妇女，出嫁以后，全成了“无名之辈”。先是在丈夫的名字下面加个“嫂”字。老了，在儿女的名字后面加个“妈”字。

巾子山区十分贫瘠，只有零零落落的小块水田可以种单季稻，日常的主食就是番薯丝。山里没有什么副业，只有几处炭窑，把杂木闷窑烧成木炭。这种木炭质量上乘，敲一下发出金属的声响，外皮上有一层泛着白色的金属光泽，山里人图吉利，叫它“银

炭”。城里人可没有那末珍贵它，只叫“硬炭”，以区别于明火烧成的松炭。“卖油的娘子水梳头”，平常也舍不得用它。那时用银炭烤番薯，是很阔绰的了。银炭文火慢慢地烤，烤出来的番薯和山药外皮焦黄，透出一股甜香。

警卫员又说：“阿兰妈说了，番薯、山药你们天天吃，家里又拿不出别的好东西，只好变个法子烤出来请你们。”

龙跃招呼吴荣膺说：“吃了再走，吃了再走。”

警卫员又送了一壶茶进来，每人面前筛了一碗，说道：“这茶也是阿兰妈专门泡的。”

这里山高，距海不远，常常云雾环绕，茶叶的味道特别浓，水又是货真价实的山泉，泡出茶来，极有香韵。

胡景域抿了一口茶，称赞道：“好茶好茶，…”

正说着，一个人探进半个身子，说道：“什么好东西？”一跨进房来，伸手捡起一个番薯就啃。

郑丹甫笑骂道：“这样一副馋相！”

这人叫金德清，特委机关的交通员。他装了个鬼脸，说道：“首长，好久没有吸洋烟了，让我开开荤吧！”龙跃笑着，递给他一支老刀牌，问道：“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德清拿出一封信，说：“玉发有封信。”

玉发姓朱，是文成玉壶区区委书记。玉壶有个党员叫胡元光，是国民党丽水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胡永孚的堂兄弟。自卫总队的队长是县长兼的，不过挂个名，胡永孚是个实权派。他向胡元光试探能不能与共产党联系。玉发请示以后，与胡永孚接触了几次，胡永孚表示要起义。玉发的信里说，看来胡永孚的起义是真心的，他要求我们派人协助他掌握部队。龙跃把信让郑、胡传阅，说道：

“形势发展得很快，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加剧了，胡永孚的起义是一个信号。”

郑丹甫看完信，说道：“派干部到胡永孚身边工作，合适的人很难挑，他要会应付国民党的官场那一套。”

龙跃说：“作敌工工作的干部我们很缺，如果派去的人不合适，反而误事。这样吧，在玉壶选些民兵，分几批插到他的总队里去，或者单独成立几个班，作为他掌握的骨干力量。胡永孚是玉壶人，从那里搞一批新兵，人家不会怀疑的。”

他问郑丹甫：“这样行吗？”

郑丹甫点点头，说：“这样好，等到考虑好适当的干部，再派去。”

吴荣膺是个谨慎的人，听到谈与他无关的事，就退到一旁。这时，他向龙跃说：“首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龙跃说：“你去吧，我不写信了，你向老曾汇报就行了。”

吴荣膺连夜离开板寮，急着赶路。他穿着粗布直襟布衫，似黑似灰，已经想像不出布料原来的颜色，肩头和肘部都打了补钉，一条也是打着补钉的兰布单裤。赤着脚，穿着一双草鞋。吴荣膺面目黧黑，与他的衣服正好匹配。四十岁不到的人，看起来快六十岁了。只有眼光特别敏锐的人，才会看出一点异常的地方：他的牙齿整整齐齐，白得发亮。山里人穷，一日三餐还顾不上，那有闲钱去买牙刷牙粉，祖宗传到现在，没有刷牙的习惯。年纪稍大，就一口混浊的黄牙。游击队员一人一副牙具，每天早上要刷牙。国民党特务列出几百种如何辨认共产党的特征，却一直没有发现这摆在脸上的秘密。吴荣膺步行的频率非常稳健，几乎跟钟摆一样，步伐轻捷，与长期在田间劳作，常常挑上百斤重的担子，步子虽有力但很沉重的样子，差别是很大的，这比牙齿更难捉摸了。就这样，他不起眼的走着，只是偶然抬头四面张望一下。中午，他在山间小路边一个独家村里吃饭，房东就是联络员，他询问了前头的情况，继续赶路。下午，快到纸山县委机关的驻地时，他才常常朝两旁和后面看看，注意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出现。